

1912年首任校长唐国安说：“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感情是无比深的。毕业于清华外文系的季羨林先生曾说：“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其实，对许多清华学子来说，Tsinghua is not a real hometown, but is really a hometown.

1924到1928年担任校长的曹云祥说：“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

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清华学子对国家的感情是无比深的。徐葆耕教授就认为，“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

一个世纪来，许多清华人的言与行、思与情，点点滴滴汇成了清华园的风骨，如果用陈寅恪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语言来说就是：发扬真理，爱国爱民。

或许，也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知识与爱。

话说清华白楼

○黄培

科技的发展使世界的空间变小、距离缩短。清华的发小们利用互联网微信群，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清华园孩子”联系在一起，大家畅聊小时候的美好回忆，讲述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这勾起了我对清华白楼的回忆。

“文革”前，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分为多个住宅区，如解放前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北院、西院、照澜院、普吉院、胜因院、新林院，解放初期学苏联修建的教工宿舍1~8公寓，为校级领导和高级教授修建的9~12公寓，鹤立独行的13公寓，1950年代为教职工修建的连排平房一区至六区，1960年代初为教授修建的15、16、17公寓，等等。这15、16、17公寓因其外观涂有白色水刷石面层而被称为白楼。

我家是1961年从照澜院搬到清华白楼的。那时虽然都住在清华园，但是由于住在不同的家属区，受文化氛围和家庭环境

的影响，不同住宅区的孩子还是能看出来。有件事使我记住了白楼孩子的与众不同。那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清华主楼建筑群已经竣工但是尚未投入使用，因为我父亲黄熊（建筑结构专家）参与了主楼的建筑设计，所以我对那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充满了好奇，非常想进去看看。清华主楼高10层，当时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物，加上东西两个配楼，总面积有7万多平方米。从1956年开始建造至1966年完工，建造的标准和质量直到20世纪末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我们这群孩子的眼里，当年的主楼相当于清华的人民大会堂，神圣而庄严。

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央求看门的大爷允许进去看看。大爷问我：“你家住哪儿呀？”我说：“白楼。”大爷脸色立刻大变，呵斥道：“住白楼的孩子还想进主楼看看？没门！告诉你，这里的装修还没你

□ 荷花池

们白楼好呢！你要想看就回家去看吧！滚！”我真不知道自己哪句话惹怒了他，但是记住了：以后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我家住在白楼。

清华白楼坐落在清华校园的西区，毗邻清华西门，一条不到十米宽的万泉河将它与学校主干道清华路隔开，环境清幽典雅。万泉河源自海淀万泉庄西，最后流入清河。那时河上仅有一座可容一人通过的没有桥栏的钢筋水泥桥，外人不轻易走，所以在孩子们眼里，白楼更像是世外桃源。

小时候听我父亲讲，清华大学师生自己设计的白楼，最初是为苏联专家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还好的时候，清华不但聘请了苏联列宁格勒土建学院的萨多维奇专家担任校长顾问，还陆续聘请了60多位苏联及东欧专家来校指导教学改革工作。因此白楼的设计模仿了苏联建筑，每家窗台前都设计了摆放鲜花的花坛，防震级别采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标准，内部装修生活设施齐备，供应热水和暖气。因为苏联人喜欢晒太阳，所以楼顶特意设计为宽敞明亮的平顶露天晒台，白天可以清楚地看到颐和园佛香阁和玉泉山塔。

白楼交付使用后，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将新房分配给了本校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学校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居住，因此那时清华人都称白楼为教授楼。

白楼房屋的户型设计每栋不同，分配对象也不同，主要是按照教授级别和行政级别分配的。16公寓大多数住的是三级以上教授和校级领导干部，15公寓和17公寓大多数住的是六级以上教授、副教授和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另外，从居住环境来讲，白楼一层比其他楼层门前面多了一个



1967年春天，黄培在白楼前留影

小花园，可以种植花草树木。为了照顾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和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一层住宅全部分配给了这批人，他们大多数属于清华的“108将”，也是清华教师中的宝贵财富。

清华“108将”的称呼来自于蒋南翔校长的讲话。蒋南翔在清华工作期间，对知识分子一直抱着真诚团结的愿望。当时，清华教师中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108人，蒋南翔就经常讲“108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他还多次谈到，高等学校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巍峨的高楼大厦和贵重的仪器设备，而是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教授和副教授。团结老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办好高等学校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他引用梅贻琦校长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关于清华“108将”的由来，1953年主持这项工作的清华大学原副校长陈士骅回忆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学校进行教师定级定薪工作，时为1953年初。由钱伟长主持，北大方面来的人，由陈士骅基本拍板。按年资、学历、著作、发明定。博士是教授，副博士（硕士、特许工程师）为副教授。年资，在学校一年算一

年，在校外三年算一年，到了十年头，就可以为教授了。定级定薪先以某系为标兵，纵向排队，横向比较，调整而定。最初定了103人，在工字厅，陈士骅对蒋南翔说：还差5人就是108将了。蒋十分得意，就同意加5人，就成了108将了。”当年清华大学被评为一级教授的有14人，包括：刘仙洲、张子高、陈士骅、钱伟长、张维、陶葆楷、孟昭英、赵访熊、马约翰、梁思成、章名涛、张光斗、施嘉炆和谢祖培。一级教授黄文熙是1956年从外单位调入的，所以那时清华一级教授共有15人。1955年，随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产生了第一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清华大学有7人名列其中：刘仙洲、钱伟长、张维、孟昭英、梁思成、章名涛和张光斗。

如国内著名的排水工程与环境工程专家陶葆楷、电子学家孟昭英、国际知名焊接专家潘际銮教授等，那时都住在白楼。电机工程专家、朱镕基总理的老师章名涛教授在“文革”初期也搬进了白楼。

那时清华新房分配是按照单位进行的，不像现在是按照个人学历和资历计算

总分排序分配的，因此白楼各系教师居住地点相对比较集中。以我家居住的17公寓一门洞为例，除一层居住的是两位外系教授（101号是留美博士、电机工程系教授童诗白，102号是留美博士、水力工程系教授陈樑生），其他各层住的全部是土建系（那时土木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合并）教授、副教授和归国华侨。如201号是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家，202号是邝守仁教授和江丕权教授两家，203号是莫宗江教授家，301号是朱畅中教授家，302号是黄熊教授家（我家），303号是胡允敬教授家，401号是吴增菲教授家，402号是康寿山教授与关肇邨教授两家，403号是罗福午教授家，501号是赵炳时教授家，502号是楼庆西教授家，503号是李承祚教授家。二门洞也住有土建系教授，如304号是汪国瑜教授家。其中莫宗江教授、胡允敬教授、汪国瑜教授以及住在16公寓401号的张昌龄教授与梁思成教授共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设计，他们的贡献被载入史册。其他各位教授都参与过国家重大建筑工程的设计，对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住在这种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所听、所看、所接触的事物肯定与众不同，成长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单位同事宅邸相对集中的好处是商量工作方便，小时候我常拿着父亲写的字条或者图书等，送到楼上或楼下的某位教授家，所以与各家的大人和小孩都比较熟悉。坏处是在“文革”中才体验出来的。“文革”期间，哪位家长受到冲击或者政治上受到当



白楼外景

□ 荷花池

权派的怀疑，外系的大人可能还不清楚，门洞里的孩子就都知道了，住不住在白楼是衡量家长有无“政治问题”的风向标。那时清华房管处的人政治嗅觉非常灵敏，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如果有谁受到“政治审查”，即使性质未定，也必须搬出白楼。白楼发小滕运先生在《清华校园往事》中写道：“‘文革’前父亲作为校党委委员、化工系主要负责人，我家住在16公寓……‘文革’初期搬到了17公寓……后来又搬到西院……”也就是说，随着他父亲滕藤先生政治命运的起伏，他家的居住条件从四居室搬到两居室，后来又搬到平房……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被各派随意批斗，有的白楼人家即使没有搬出白楼，也被“掺沙子”搬进一家工人或者造反派，24小时监控你的一言一行，完全没有个人隐私。我家也因无法忍受这种“政治”待遇，于1972年搬出了白楼，搬进了由我父亲参与设计和建造的新林楼。

感谢清华这座拥有厚德载物历史文化气息的校园，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通识教育的基础，让我们拥有了应付复杂生活的本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

2016年5月14日初稿/2018年3月12日修改

诗歌、诗人与诗社

——清华大学“火石新诗社”创办人自述

○李 石（1997级化学）



李石校友

李石，1979年2月生于贵阳，1997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2001年本科毕业转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伦理学硕士

学位。2004—2007年留学意大利，在罗马LUISS大学攻读政治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教。

李石在清华求学七年，热心于学校的各类人文活动。1998—2000年，参加学生电影社团“露天社”，并于2000年任社长；其间组织编辑清华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学生刊物《露天报》，2000年获得清华大学学生社团“最佳女社长”称号。2001年，创办清华大学学生新诗社“火石新诗社”，并定期出版社刊《火石诗歌》。其诗作《露天，一个极美的词》被收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诗集（新诗卷）》。